

新旗

刊月半

發行處訊通
定價

新香港古太
西埠李船
灣振元
百三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出版

我們要替誰說話？振聲

(代發刊辭)

目前刊物太多，但也可說太少；太多是外表，而太少則是指值得一讀的內容而言。花花綠綠印着裸體照片的黃色小報不必讀，便是其他正經的大小雜誌，不也是千篇一律成套老話嗎？歌頌權威，辯護現狀的不必說，便是那些進步方面的，不也祇是在一些相當空洞的要求旁邊打轉、替現成的勢力說話嗎？

要想找到一個刊物，牠能堅定地，一貫地，為千百萬真正無告的中國勞苦大眾發言，尤其要明確地站在我們勞工的立場上說話，並且要了解國際勞工運動的情勢，能將這情勢和中國的配合起來，以謀中國勞工階級的地位改善與澈底解放，並由此而促成中國大多數人之生活改善與解放的，我們簡直還不會看見。

但是，這樣的種刊物是絕對必需的。

每一個刊物，無論牠願意不願意，也無論牠自覺不自覺，總在替社會上的某一羣人說話，這

東北問題之我見

第一

我們要替誰說話？

振聲

第一期目錄

我們要替誰說話？

振聲

東北問題之我見

從四國外長會議大敗說起

關於罷工權

工人運動的危機

兩種民主

論國民大會

革命問題漫談

日耳曼沙漠

生物戰爭和化學戰爭

論教論壇

穆德

T K 鎮默遠

尊蘭劉因

唐

Eugene Vailin

Harold R. Issa

也就是說，牠總得有一個背景的。可是，差不多沒有一個刊物肯公然承認這個事實。

「代表一切人的」，「爲全民說話的」，「超然的」，這一些形容詞，於是便成了

一個刊物想博得人們同情的必需託辭。但我們不歡喜這樣。我們歡喜說真話，因為我們不害怕說真話。我們不

是代表一切人的，不是爲全民說話的，不是超然的。我們代表大多數，貧苦的做工人與鄉下人

的。我們代表城市裏的工人，我們不代表「全

體民族」，因爲「全民」中也包含着漢奸，貪污

，高官，大吏，地主，財東……這些人，我們不能代表，也不願代表。代表他們說話的刊物是太多了，太多了，不需我們參加，我們也不願參加，我們所以要辦這張報，正是要替立場上和他們相反，利益上被他們蹂躪的人說出一些不平，伸訴，乃至積極的要求來，所以我們不是超然的，不是沒有「背景」的，而是以勞苦大眾爲背景的。

明白張膽地說出自己的「背景」，毫不掩飾地說出自己所代表的是那一羣人的利益，這是在民主政治下應有的態度。但是，現在中國的民主程度能够允許我們這樣辦嗎？我們不存絲毫幻想，但我們願以這小小刊物的命運來做一個測量。

北問題完全是對外問題，即中國與蘇聯之間的問題。其實，這兩種說法都不盡然。東北問題之興

際性是毫無疑問的，其中牽涉到蘇聯對中國的政策問題也屬顯然。但要在此時此地把握住這個問題的本質，却非首先由中國目前內部政治趨向及其爭鬥來看不可。

何以正在執政黨派受到國內諸民主勢力的壓迫而略表讓步的時候，忽而在全國範圍內提出了這個問題來？這就必須從內政方面來觀察，才能了解其意義了。只有從這方面了解，才能懂得牠其實主要是執政黨手中的一個武器，用以對付國內民主勢力與革命勢力，藉以進行反攻的。

這原本一個老手法呀！如此例子，歷史上有的是：當國內民衆拾起頭來反對一個統治之時，統治者往往就利用一個外交問題，或製造一個外交問題，使民衆的眼光自內向外，使國內的上下鬥爭變成對外的民族糾紛。換句話說，就是用「攘外」的名義來實行「安內」。本來，借

攘外」，以『安內』，先『安內』而後『攘外』，這二者是一件東西。中國的執政黨執政了二十年，如果在別的方面一無成就的話，那末至少在這一個特殊的統治藝術上，是精通至極熟了的。

故凡以東北問題為純粹的國際問題，或簡單的對外問題的人，恰恰是鑽進了這個『藝術』的圈子。

自然，東北問題也不是『純粹的』內政問題。反映於這一問題上的美蘇衝突是太明顯了。德日既倒，美國以世界組織者的姿態出現於國際舞台，在這方面遇到的僅有的對手，就是蘇聯。現在戰爭初定，而關於第三次大戰的鼓噪却已震耳欲聾。毋須說，這一切鼓噪都是針對着蘇聯的。

如果人類真的不幸而必須遭受第三次大戰的話，那末依現存的國際勢力關係看，其將以美蘇二國為主力是無疑的，同時，這戰爭在東方，將以我們的東北為前哨接觸地帶，也是無疑的。自從太平洋彼岸的盟友幫我們中國獲得了勝利之後，牠在我們這國家裏的地位顯然是提高了。經濟方面不必說，我們這裏的一盤渾賬，要全靠華爾街的巨子們來清理了；政治方面，馬歇爾元帥已成了我們家事的最高仲裁者；軍事上呢，一切都是在馬特使的統籌計劃中，整個國防計劃自將符合於聯邦未來在遠東的作戰利益，這就是說，是以防蘇聯自然不是傻瓜，她採取了防禦的反措置接着在全世界，喊起來了。

在美蘇衝突中，我們的同情是寄託在後者方面的，但這不是根據於什麼進攻與防禦的謀略，而是為了在某一意義上，即在財產的國有化上，蘇聯還保持其為工人國家的緣故。

然則，蘇聯在東北所執行的政策是否都是正確而無可批評的呢？這也不然。此次的東北問題，一方面固然是美國及其隨從者利用來反對蘇聯，

中國的執政黨利用來反對國內的民主勢力，但在另一方面，蘇聯的對外政策，也自有予人利用之柄。回想蘇聯十月革命勝利之後，列寧掌權，為要實行其革命外交政策起見，曾經公開宣言，拋棄了沙皇時代俄國在華享受的一切特權，可是現在，史太林當政的蘇聯，却以祕密條約來恢復這個為列寧所放棄的同一特權，這裏是值得人們作深思的。對外政策原不過是對內政策的延長，所以目前的蘇聯，如果真如某些人所說，比列寧時代的蘇聯更加社會主義化了，更加革命了，那末，『恢復沙俄時代特權』這一行為簡直是不能解釋的了。一個革命政府竟欲恢復帝國主義的特權，無論如何總是矛盾的。每一個同情蘇聯的人，必不可將此矛盾視作當然，必須從這矛盾裏求出一個結論來。

其實要解釋這矛盾並不難，祇叫稍稍研究一下蘇聯最近二十年來的發展過程，便可以知道：史太林的統治，雖然在國家的建設上面有了不少進步。但在革命的制度與精神方面却摧殘得太多，現在蘇聯所以還能夠稱為工人國家者，祇因牠還保存着十月革命的一個遺物，財產的國有制吧了。

因此，我們雖然在國際的紛爭中站在蘇聯方面，但對牠的統治層在國內外所執行的有害政策，却仍舊要反對的。並且祇有反對這種政策，纔是真正的愛護蘇聯。有些盲目的蘇聯擁護者，無一不贊成，無一不擁護，以致連牠的『恢復沙皇特權』都無條件擁護起來，其結果是祇能有害於蘇聯的。

綜上所述，我們對於東北問題，應該從這三方面來看：第一，也是頂重要的，我們要明白這問題此次被提出的動機與對內的政治含義，我們反對執政黨利用這問題來阻擋國內民主勢力的進展，鎮壓民眾的興起，反對蘇聯；第二，我們要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必須劃清自己的國際主義立場與狹隘的國家主義派的反蘇聯立場之間的不同。我們不是反對蘇聯，而是反對牠的現當局及共害的政策。

至於東北問題之實際解決，我們堅決地反對應用內戰的方法。徒苦民衆的內戰是必須立即停止的。東北的主權與政權問題，必須交由和平直接祕密與普選出來的全國民大會來處置，必須讓東北人民以最民主的方法來自己決定。

從四國外長會議失敗說起

蘭 因

歐洲戰爭終止剛滿一週年，那裏又劍拔弩張起來了。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爭奪特里埃斯特，不言兩國，還沒有多大關係，不幸的是南斯拉夫背

後站着蘇聯，而意大利有英美二國撐腰。難道第三次大戰就要起來了麼？——大家奔走相告着。這一切恐慌，是由巴黎盧森堡宮四國外長會議底失敗引起來的。人們很天真地以爲美蘇英法四國外長，或杜魯門，史大林，艾德禮三巨頭，祇要互相讓步，同意一些辦法，就可以解決歐洲問題。現在他們各執己見，於是災禍臨頭了。

但是外長會議失敗固然不能解決歐洲問題，外長會議成功，甚至巨頭會議成功，那時能解決歐洲問題麼？那時至多把危機推延一個時候罷了，並不能消滅危機，歐洲問題並不能解決。歐洲有那麼多無食無衣無家可歸的人，急待救濟；但救濟是不夠的，必須讓他們加入經濟的生活，即必須恢復工業和交通設備，給農具，肥料，種籽與農民；但做到這一步還是不夠的，又必須撤除一切國家疆界，把歐洲形成一個經濟體，使得其中人民同屬於「歐洲社會主義合衆國」之下。

歐洲再沒有比現在更需要一個「合衆國」了。世界文明最發達的一洲，牠的生產力早已超出國家疆界範圍外去了。洛蘭有鐵，薩爾有煤，不幸前者在法國疆界以內，後者在德國疆界以內，合則兩美，離則兩傷。這煤鐵分合問題，也是兩次大戰爭起因之一的。即此一例可概其餘。歐洲若是仍舊保存那些疆界，這一二十個國家若是仍舊自成經濟單位，有各自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系統，那麼即使恢復到二次大戰前水準，仍然要爆發戰爭的。必須打破國家疆界，成立聯邦。

「歐洲合衆國」理想很早就有了。若干資產階級政治家也會於兩次大戰中間提出這個主張。

可是我們對於歐洲資產階級，無論那一國的，久已失去信心了，他們久已沒有發揮甚麼進步作用的能力了。「歐洲合衆國」祇能由各國無產階級以革命手段來完成。這個聯邦國家若能成立，必是「社會主義合衆國」，而非如美國那般的「合衆國」。

美國能够救濟歐洲饑荒，必要時也許能够部分地恢復歐洲生產和交通設備，可是牠決不願歐洲有個「合衆國」，更不願有個「社會主義合衆國」。

英國也不願這個「合衆國」成立，因為英國現在已經把歐洲一部分當作牠的市場，藉以相當補償牠在戰爭中和戰後的損失。

蘇聯也不願這個「合衆國」成立，不僅因為牠的領土擴張將停止於這個「合衆國」邊緣，而且因爲歐洲無產階級抬頭起來，將助長牠國內無產階級勢。

歐洲問題底解決，首先是歐洲無產階級自己的事情。無產階級現在應當提出「歐洲社會主義合衆國」口號，同時補充以「保衛歐洲革命以反對牠的一切敵人」口號。

關於罷工權

劉默

中國的工人們，尤其是上海的工人們，在長年的消沉與被壓迫之後，現在開始抬頭來，開始要過一種新的生活了。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八個月中，上海的工人階級已憑其本身力量，爭得了好些生活上的改善，而更重要的，在這幾個月的鬥爭中，上海差不多每一個產業部門，甚至每一種商業的職工，都已建立起自己的工會。不管這些工會目前的領導如何，而這普遍成立工會的事實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十分重大的成果了。這表示中國工人生活史上新的一章的開始，也是他們英勇的傳統精神的復活。

自然，現在不過是開始而已。過去幾個月的道路，他們在打倒北洋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大搏鬥中，曾經起了主要作用。不幸得很，在鬥爭的半路上，他們被領導者欺騙，被「同盟者」叛賣而遭受了悲慘的失敗，以致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計算起來，到現在已十足的十九年了。十九年中，他們是連最起碼的工會組織都被禁絕了的。他們受苦，他們挨餓，他們失業，他們默默地死去，而對這一切，他們是連半句不平都不能訴說，更談不上行動上的反抗了。在「自己人的」統治時代如此，在敵人的統治時代自然更甚。

中國的工人階級不但在戰鬥的「質」的方面是如此地降低了，甚至，在那時期中，連這階級的量的方面也給減少了。不斷的經濟恐慌，連續的國內戰亂，最後再加上那八個整年的抗日大戰，使中國的工業衰落了，在某種限度內毀滅了。在五卅前後號稱八十萬的上海產業工人，到去年八月間日帝投降的時候，差不多祇賸着四分之一了。

雖然在他們張貼的傳單上偶爾也看得到一些民主的要求，但是一般說來，他們的覺醒還不會達到政治鬥爭的地位。

但資本家和他們的幫手們却已感到了恐慌，他們已準備制定法律專條來對付罷工；同時一些自命為「工人首領」的人，也在發出「廣告」，叫我們要『勞資合作』了。有些反動的報紙上拼命在製造輿論，說工人的生活過得多麼寫意，說工價高是物價高涨的原因，又說工人的罷工妨礙了『民族資本家的產業復興』。他們反對罷工，他們要禁止罷工。

其實，我們工人如果不能罷工，那末沒有一個資本家肯來跟我們『忠誠合作』的。罷工是一個資本家肯來跟我們『忠誠合作』的。罷工是一無所有的工人們的唯一武器。如果禁止了這武器，或自動放下了這武器，則非但生活改善和職業保無從談起，便是幾個月來既得的成果，也就會全部失去的。

工人的罷工權，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基本權利之一。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間的一個最重大的分別，就是罷工權之是否被取消。因此，如果真想中國走上民主的道路，那末工人們，乃至一切真心為民主鬥爭的人們，必須為罷工權之合法承認而鬥爭。

五、一。

工人運動的危機

鎌 遠

日本投降以後，上海工人為了要求勝利津貼，增加工資，或恢復職業，紛紛起來罷工，逐漸組織了工會，建立了他們中間的聯繫。這個潮流到現在蔓延了幾個月還在向前進展。工人階級拾

起頭來了；不僅是日本侵入後第一次，而且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後第一次。

然而剛纔覺醒起來的工人羣衆，他們的意識還落在自身運動的後面。長期的失敗造成的頹喪情緒，還深深地留在他們的心胸，外加資方明的暗的硬的軟的反攻，以致運動前面隱伏着種種的危機。

第一，工會上層領袖並非從工人鬪爭中產生出來的，不能真正代表工人利益。上層組織成爲政府機構一部分，總是把工人鬥爭與『強迫仲裁』，『警察監護』等形式結合在一起，處處束縛在合法的圈套裏，工人一舉一動都得受政府的干涉，因此不能完全發揮鬥爭的作用。

第二，改良主義傾向支配了工人運動，人們企圖利用羣衆的落後，強調『勞資合作』，鑿定『官僚買辦資本家』與『民族資本家』之間的區別，理由是：『代表少數既得利益集團的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是資本主義強國的尾聞，要把中國重新回復到戰前半殖民地的附庸地位，我們工人應該反對牠的；至於代表多數的民族資本家，

是代表獨立自主建設現代化中國的，從整個利益上看，我們工人同民族資本家的利害關係是一致的。』所以我們當前的工運要堅持勞資合作，發展民族工業的路向。』其實『官僚買辦資本家與『民族資本家』是沒有甚麼區別的，二者同樣剝削工人。中國整個經濟現在都成爲資本主義強國之尾聞了，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不過有程度的不可勞資合作，對於所謂『民族資本』也是不可

宣傳，說是工人破壞勞動紀律，說是工資支出太大，工廠即將破產了。資本家如此將中國工業競爭不過資本主義強國之責任加於中國工人階級頭上，彷彿以爲工人必須餓着肚子，做牛做馬，來替資本家爭取足夠的利潤。這種宣傳是爲的使社會失去對於工人要求的同情心。

第四，政府於『強迫仲裁』失效後，也不惜採取高壓手段。如電力公司罷工時逮捕工人代表，綢織工人罷工時槍殺工人等等。

以上便是目前工人運動危機諸要點。要克服這些危機，祇有靠工人階級自身的力量，即提高自覺心，認清鬥爭的目的，組織完全屬於自己的工會，不僅要組織職業工會，而且要組織工廠委員會。工人有了覺悟，有了組織，就會從經濟鬥爭進而爲政治的鬥爭了，即是參加和領導民主運動，發展之直至那解放工人階級以及一切被壓迫的人類的革命。

兩種民主

K. T.

前幾日在五四運動文藝紀念會上，周予同先生說道：『在五四時所提出的民主口號是資本主義性的，現在已變爲社會主義性的了。』

在普遍的民主聲中，這是一個特出的聲音。俄國的列寧先生說過一句話：『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才講到一般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却絕對不能忘記這樣設問：『爲的是那一個階級？』』

在爲民主而奮鬥的時候，我們自然不能忘記

時至今日，國民大會彷彿真的為全國人民所要求，至少，為全國各黨各派所一致提出的了。但若問問各人所要求的是那一種的國民大會，那就言人人殊，各說各的。這不是因為國民大會本身是什麼神祕的東西，而是因為國民大會原是一個空洞的名詞。或空洞的機關，牠能够由各種不同的方法來產生，能由各種不同的內容來充實，且能够賦有各種不同的權限。這些個「各種不同」，則是由於某時某地某一國家內部各個利益相反的階級的態度，以及牠們的力量對比來決定的。為貴族地主所把持的國會，當時當不過是專制皇權政治的裝飾品，這些國會，除了用人民的名義給皇帝的虐政加上一道護符之外，沒有別的作用。為資本階級的地主聯合控制的議會，實際上也是代表着少數人的利益的，他們借用人民的名義，給土地與財產的私有，加上了一次確認與保障。對於其他部分的人民，則除一些法律上的『平等』之外不會給了什麼實惠。真正要解決人民與國家諸根本問題的國會，祇有容納最大多數民眾的代表，並且要由這些代表們占據地位，才能實現。這

是空論的，例如法國一
七九二年的國約會議，便是屬於這一類

論

國

民

大

會

三

男

我們中國現在需要那一種的國民大會呢？給獨裁政治當裝飾品的嗎？
那必須我們要求，人家已經給了我們了，國難會議，參政會，乃至一九三一年通過了約法的『國民大會』都去的。這樣的國會，除了糜費無數國帑之外，簡直連裝飾民主的作用都不會起的。我們乾脆的不要這樣的東西。

那麼像美國那樣的國會如何？好當然好。美國式的議會制度，比起我們的『訓政』來，真有天壤之別了。但是我們要曉得，美國式的民主，自有美國式的社會制度作基礎的。這個基礎在其初期是美國特產的獨立的農民，在後期則是在賺取全世界超額利潤的龐大的資產階級。沒有前者就不能有美國式的民主，沒有後者則不容有這樣的民主。

中國目前是既無前者而又無後者，有的，一方面祇是赤貧，破產，奴役，無告的勞苦大眾，另一方面則是貪婪而恐懼的各類有產者。在此情形中，倘想簡單地照抄美國式的由資產者控制的民主制，結果總只有成敗

『論淮之橘』，成為一幅可憐的諷刺畫的。三十餘年的中華民國史上，已經有過不少這樣變質的橘子，不少這樣的諷刺畫了。那末，我們中國究竟要與能有怎樣的國民大會呢？簡單的回答：牠必須比美國式更徹底的，更民主的。換句話說，必須由全國人民中占最大多數的人，在國會中占最大多數。

祇有最徹底的民主，才能在歷史發展上落後的國家中實現出來，並解決問題，這話初聽似乎離奇，其實却是真理。因為在帝國主義時代的落後國家中，有產階級『欽賜』民主的可能愈少，而廣大民眾也就愈加必須用最徹底的步驟，才能獲得並鞏固自己的民主權利了。

那末最徹底的民主的國民大會是什麼呢？這便是用平等直接無記名方法普選出來的全權的國民大會。明白些說，就是這個國民大會，必須由全國人民，不分男女、老小、貧富、貴賤，凡在十八歲以上心智健全的人，就可以投票。國大代表應由他們直接選出，不能由政府或其他機關指定或推出。須採用秘密投票制，以免選舉人遭受逼害，同時如此選舉出來的國民大會，應該賦有

解決國家一切根本問題的全權，不是祇替政府立法，更不是徒作裝飾之用。

現在政府所擬召集的國民大會，當然不是我們所要求的。牠不是人民選舉的，而是由政府及黨部派定的。牠的職權，不是解決問題的（自然牠也不能解決問題），而祇是要通過政府所已擬就的『三民主義的憲法』。家解決根本問題了。

如果國民大會真能如此產生，真能具有全權，則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工農勞苦大眾，自能指揮大會，自能為自己謀利益，也就是為國民大會，應該賦有

依我們之見，中國如果真想民主，真想和平，真想統一，真想解決國

家的一切根本問題，則非立即召開我們上述的國民會議不可。因為祇有這樣的國民會議，才能代表全體人民的意思，才能超出於目前所有這些既成黨派的利益與糾葛，才能有真正的威信，真實的權力，藉以解決國家的重大問題，如：政權形式，兵隊改編，經濟改造，農村革新，以及一般民主之徹底改善。

如果不從這根本方面着手，固執於目前既成黨派的利益，從事於上層的政治拉攏，下層的武力衝突，結果即使成立了所謂『聯合政府』，劃定了各黨武力的地盤，召開了所謂『國民大會』，而對於國家的根本問題，亦即有關於全國最大多數人命運的大問題，却仍舊不會解決一個，也不會解決一個的。

所以我們絕對不能贊成政府所將召集的『國民大會』，也不贊成目前共產黨以及其他各黨派所熱烈爭執的『分贊式』的國大。我們認為要打開目前中國所陷入的殞局，唯一辦法，就是各個政黨放棄他們各自的法統觀念，他們的偏狹成見，讓全國真正的人民，能够自動起來說話，充分自主地選出他們的代表，由這些真正的人民代表來評斷一下過去各黨各派，亦即這些『公僕』們，所爭執的是非，並進而決定最大多數人民的命運，解決國家的根本問題。

但是那些事情才算得國家根本問題呢？我們所要求的國民大會，應該解決些怎樣的問題呢？我們試略舉如下：第一，當然是政權問題，普選全國的大會本身應該就是一個真正與直接替人民大眾做事的民主政府，牠應該代替舊有政府，或『聯合政府』；第二，牠應該立即接收與統編全國軍隊，用最民主的方法，成立各級兵士委員會，由兵士大眾自己決定舊軍隊的命運，並組織新的人民武力；第三，民選各級官吏；第四，用革命手段解決目前的經濟問題，沒收漢奸，貪污，發國難財及勝利財者之財產，救濟貧民；取消一切苛捐雜稅，立即停止增發通貨，反對依存外資；第五，徹底改善勞工生活，實行八小時制，由工人管理業已沒收之敵僞工廠；第六，實行『耕者有其田』，沒收地主土地，分配於貧苦農民及退伍兵士，第七，反對帝國主義干涉內政及武力駐屯，保證中國民族之對外獨立與對內自決。

但是，有人會問，這樣的國民大會真能產生嗎？這樣理想的政綱真能

實現嗎？我們不會是徒唱高調，甚至流於幻想嗎？對此疑問，我們的回答很簡單：一切都得看中國的勞動大眾為之鬥爭的決心與力量來決定。

我們毫不幻想，我們十分明白，在目前的政治形勢中，在政治的，特務的，警察的與保甲的層層指揮之下，非但我們上述的國民大會及其政綱無從實現，便是多少帶有幾分真民主的國民大會也是不能產生的。

因此，我們認為：在為這個最徹底的民主議會鬥爭之時，必須同時進行鬥爭，反對現存的各種壓迫。

我們要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的完全自由。

五月一日香港

美國參戰之後果

十五年來美國工業生產增加如下表：

一九三九年九九四萬萬金元	一九三三年五四八萬萬金元
一九四五年一九八七萬萬金元	

總之，二次大戰前後，美國工業生產增加了一倍以上。

據官方估計，汽車業生產，一九四五年為五〇〇·〇〇〇單位，一九四六年將為三·七〇〇·〇〇〇單位，一九四七年將為五·〇〇·〇〇〇單位。

一九四七年，建築業將使用六五萬萬金元，即比一九四五年增加百分之四四，其中十萬萬金元將用以建築工廠。

美國船隻，二次大戰前總噸位為九·三〇〇·〇〇〇噸，現在則為三四·〇〇〇·〇〇〇噸。

他方面，美國此次戰爭損失共三四一〇萬萬金元，即等於上次戰爭損失之十一倍，又等於從一七八九至一九四〇這一百五十一年間聯邦政府總支出之二倍。

美國國債現達三千萬萬金元，即每人應攤二·一〇〇金元，而每年應付利息共達六十萬萬金元。

革命問題漫談

穆德

那麼，在我們面前的就是如何革命問題了。

中國又處於狂風暴雨前的局勢了。

做這局勢特徵的，還不是那些政治現象，如召集國民大會，結束一黨專政，釋放政治犯，廢除若干束縛人民自由的法律等等，而是這個含有更深刻意義的現象，即是大城市羣衆運動底復興，尤其沉寂多年的工人運動底覺醒。

羣衆覺醒底精神上的特徵，就是羣衆對於政治的興趣；這興趣可以從政治出版物種類底複雜，政治性座談會，講演會底繁多，看得出來。羣衆不過對於政治發生興趣而已，但政治意識還是模糊的，還在彷徨，在尋找出路。這一方面表明羣衆覺醒底初期狀態，他方面也預告這覺醒將有遠大的前途，將發生深刻的影響，因為羣衆並不肯貿然接受了現成的黨派底現成的理論。羣衆對於現成的黨派及其現成的理論都採取着批評的懷疑態度。而毅然決然走上這條道路，

應當怎樣幫助羣衆去發現正確的道路呢？應當怎樣縮短這不可避免的徘徊的探索的過程呢？

二

大家都覺得有一個大事變在等待着我們，但不見得都能認識這個大事變底性質。

等待着我們的，是甚麼呢？牠不是別的，正是革命。有人說，在我們面前的是如何建國的問題。但中國不再經過一次革命，是談不上建國的。又有人說，在我們面前的是如何應付第三次世界大戰問題。但第三次大戰，同第二次大戰一般，本是世界革命未曾成功之後果；以中國在世界所佔的重要位置而論，中國若能好好地舉行一次革命，定可轉變世界局勢，或者能根本消滅第三次大戰，或者能延緩未來大戰發生至比較長久的時間。

現在流行的議論反對我們這樣提出問題。一部分人以為革命業已成功，從此沒有需要了。對於這部分人，我們不必與之辯論，因為他們不久就會覺悟革命實在尚未成功，而手忙腳亂起來應付革命問題。另一部分人明知前面大路必須通過革命，但害怕革命，而想走着那些迂迴的小徑，繞圈子，從革命身旁兜過去。對於這部分人，我們應當說：革命難免犧牲，我們若能避免革命仍可達到同樣目的，則無論是誰都願意避免革命的。革命本非人類情願做的事情。可是根據世界各國歷史發展事實，以及由這些事實歸納出來的科學的法則，我們知道歷史發展到了某一階段，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無論走着如何迂迴的道路，部不能繞出革命以外而通到前面坦途去。過去，當必須革命的時候，也有人嘗試着去走迂迴曲折的道路，結果總是既不能避免革命，又造出更多的不必要的犧牲。中國現在正處在必須革命的時候，一方面自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尚未完成，他方面世界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又迫在眉睫，把中國也捲入牠的旋渦之中。凡不能避免的事情，凡不得不克服的難關，我們都應當拿出勇氣，睜開眼睛，向前去做。第三部分人也承認不能避免革命，但有意或無意歪曲革命，或那種其實不是革命的事情硬派做革命，他們這樣做，不是為了反對革命便是為了避免革命。對於這部分人，我們需要與之很詳盡地辯論。

首先，我們應當弄明白：革命以甚麼為目的？

革命乃是歷史發展從較低的社會制度轉到較高的社會制度去時不能不通過的關頭。人類歷史發展是受社會生產力發展所推動的。生產力發展至一定的階段，人類社會就形成了一定的生產關係與之相應；這些生產關係之總和構成了社會經濟，在經濟基礎上又建立了政治、法律、宗教、思想種種建築物；經濟基礎和若干上層建築構成了社會制度。初時社會制度是與生產力相適應的，是能促進生產力向前發展的，可是生產力愈加向前發展，這種相適應狀態就漸漸低減，社會制度就漸漸不能促進生產力發展，反而要妨礙生產力發展了。結果社會關係成了生產力底桎梏，二者中間發生鬥爭，最後生產力衝破這個桎梏，飛躍起來，牠毀壞了舊的社會制度而創立新的社會制度。這就是革命。生產力再向前發展，新的社會制度又漸漸變舊了，漸漸變為桎梏了，那時又要來一次革命。如此類推。在人底關係

上所說來，則革命首先表現在社會階級底昇沉。在舊社會制度下佔支配地位的階級被推翻了，而舊時一個或數個被支配的階級起來在新社會制度下佔據支配地位。平時的階級鬥爭在革命時發展到最高峯，到了決勝負的階段。這是公開的使用暴力的殘酷的決生死的鬥爭，然而那是不可避免的。

在近代歷史上，我們看見了好多次的革命，從十六世紀的荷蘭獨立到不久之前的西班牙革命。但按照性質，我們可以把近代諸次革命大體區分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兩類，前者是毀棄封建的或前

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而代之以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後者則是毀棄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而代之以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前者推進資產階級為社會主人，後者則先推進無產階級為社會主人，再漸漸廢除社會一切階級區分。

一個國家完成了上述性質的一種革命之後，有時還補充以一次或幾次較小的革命，例如法國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這種革命非變更社會制度，而祇要改善此社會制度，並非要推翻支配階級，而祇要拿其中這個階層去代替那個階層。這樣的革命意義比較小些，往往被稱為『政治的革命』，只別於上述的『社會的革命』。

由此可見，革命乃是以根本變更社會制度為目的的。即使是最政治的革命，也須是在這個國家已經成就了社會的革命之後，即根本變更了社會制度之後才有意義的。

其次，我們應當弄明白革命是誰做的事情？

革命不是若干英雄偉人底事業，而是廣大羣衆底事業。革命和非革命是有明顯區別的，即在非革命之時，國家命運是操持在若干所謂政治家手裏的，他們有些稱為帝、王、首相、大臣、將軍，有些稱為總統、總理、部長、議員或大政黨領袖，總之，他們是那些自命為奉神意或民意來治理國家的人；在革命之時，則是廣大羣衆直接干涉國家大事，羣衆以其集體行動把國家底最高權力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時自然也有政治家，也有代表羣衆施行這個最高權力的人，但他們簡單奉行羣衆底意志，一不稱職即能為羣衆所罷免而立即有其他的代表起來代替他們的位置。所以，如果廣大羣衆站在局外，僅由若干政治家從上而下施行種種改革，不論這些政治家如何聰明，改革得如何好，如何有成效，仍不能稱為革命，至少不是我們所說的革命。

上面所說的廣大羣衆自然包含軍隊在內，但並非僅指軍隊而言，不論軍隊數量如何多，有組織有武裝的軍隊在長官命令之下直接干涉國家大事，是歷史上常見的事情，這些長官自稱此事為革命，他人也有稱之為革命的，但這種軍事行動若非更廣大更深刻而羣衆行動一部分，與真正羣衆行動相輔而行，仍不能稱為革命。所謂真正羣衆行動，就是在社會生產上佔據重要地位的階級底羣衆行動。

最後，我們又應當弄明白革命用的是甚麼手段？

革命雖不排斥和平手段，但決不避免必要的暴力手段，雖志在建設，但決不撇開破壞。和平的，不流血的，純粹建設的『革命』，是不能稱為革命的。革命本是社會發展底『突變』，是『漸變』積累到了限度而不得不飛躍的。『革命』本身就含有『暴力』『破壞』『犧牲』『流血』種種的意義在內。非破壞不能建設，而在突變當中的破壞自然帶着震撼的暴力的性質。綜合以上所說，我們可以給革命一個明白的界說：

革命乃是廣大羣衆以暴力的行動，直接干涉國家大事，為了破壞或改變舊有的社會制度，而代之以新的社會制度。

根據這個界說，則凡爲了保持舊社會制度而做的事情當然不能稱為革命，凡非廣大羣衆行動而祇靠那些職業的政治家或純粹的軍隊而做的事情當然不能稱為革命，凡排斥暴力，反對破壞，標榜和平建設而做的事情當然不能冒稱革命。

(未完)

英國參戰之後果

從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四年，英債額赤字增加了二十二·三倍。英國國債現在超出了一百四十萬萬，其中四十萬萬是外債。對外貿易劇增，戰前用出口貨，國外投資進益及商船贏利來補償的；現在則出口貨從一九三八年的四萬七千一百萬磅減少至一九四五五年二萬七千二百萬磅，即一〇〇對四二之比；國外投資進益減少至一九三七年的半；商船，則經戰爭之後，從二千零二十萬噸減少為一千五百萬噸了。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煤炭出產從二萬二千六百萬噸減少到一萬八千五百萬噸。

New Chronicle 報駐柏林通信員諾曼·克拉克報告說：

『同盟軍負公共衛生責任的當局，爲了制止那蔓延全國的災禍，現正命令本城各區市長採取步驟，俾使本年冬季掩埋死屍之工作容易進行。從現在起就要預先掘好墳墓了，因爲營養不良的人幾個月以後將沒有氣力去掘墳的。』

我們試設想，上面一段通信如果不是印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英國報紙上面，而是印在史大林格拉戰爭前的納粹報紙上面；試設想通信中所說的城市，不是柏林，而是華沙，或哈爾夫，或烏斯德丹；——那麼定有一陣恐怖浪潮瀰漫於自由世界內。那時將沒有甚麼醜惡字眼足以形容這段通信所揭露的殘暴行爲了。當初我們讀了貝爾森集中營故事的報告時，會發了一陣冷戰，幾乎不信人間有此殘忍事情。但現在，納粹德國失敗和各地法西斯崩潰以後，發生的事情，不是別的，正是把德國以及奧匈一大部分土地，轉變爲一個大規模的貝爾森集中營。我們也是同納粹一般善於算計的，即命令人家趁他們自己未曾爲了饑寒疾病而耗竭氣力以前，就把自己的墳墓挖掘好。

在柏林及其他地方，幾乎所有的機器，辦公傢俱，以及任何種類的設備，都被搬走了，送到東方去。連居民私人所有的物品，被褥，鋪蓋，照相機，電話機，腳踏車等等，也是這般搬了去。凡是能被發現的牲畜都徵發了，所有車輛，從馬車直至火車（連柏林英軍防區的車輛在內），凡能移動的，都開到東方去。這就是說人家讓當地居民沒有食物，沒有工具，沒有修補房屋，道路，溝渠的用品，沒有生產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手段。維也納也是在同樣條件之下。

但這不過是整幅畫圖底一部分罷了。人們不顧波次坦會議協定，把奧德河和奈士河以東波蘭佔領區以及捷克境內蘇台德區所有的德國人都逐出了。這些一無所有的難民同潮浪一般湧入柏林區域。那裏無食，無衣，無住，又無醫藥，他們祇好死在大路上或瓦礫堆裏，正如那些納粹鐵蹄下犧牲者死在貝爾森集中營裏一般。這些難民很不少哩，他們有八百萬至九百萬，其中包含着真誠反對納粹的人。

日 曼 沙 漢 倫 敦 論 壇

機構現在差不多完全廢置不用了，於是德國西方幾個隣國都蒙受其惡影響。……在歐洲，各國經濟生活是互相依賴的。大多數國家，連過大蟲炸的德國在內，工業潛能還是存在的；破壞了的乃是那種運動機構和補充器材的組織和領導。』

按上面的文字譯自英國工黨社會主義左翼底機關報，《倫敦論壇》（London Tribune）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出版，——距離現在已有八個月了。我們不嫌明日黃花譯載於此的。是爲了中國論壇上始終未見一篇同情於軸心國內現在正在受苦的民衆的文字。戰爭是一國資本主義上層領袖底罪惡，下層民衆是無辜的，受欺的，被害的。這個簡單道理，在上次大戰時候及以後，說的人很多，可是此次大戰便不同了，無論軸心國或民主國，人們都把下層民衆混同於上層領袖，要整個國家民衆担负少數野心家發起戰爭的全部責任。但這是錯誤的。這種錯誤觀念繼續下去，不僅戰敗國不得翻身，連戰勝國自己也将受其影響同歸於盡了。

以上一切情形，可以從若干統計數字看得出來。從柏林來的官方報告，同盟軍共同佔領柏林的一個月，死亡率達到千分之六一，而嬰孩死亡率則超過百分之五〇。所有從十五歲至四十五歲的婦女，至少十分之一傳染了梅毒，有些地區甚至百分之五〇有梅毒。

稍微有點想像力的人都不會相信這種狀況能够繼續長久的，不會相信佔領軍能够多年安心地充當這破產之國底管理者。六千萬人喪失了他們國家東部一大片領土而緊擠在大大縮小了的區域裏面，如果沒有工業一定不能生存的。在此條件之下，甚麼民主化都談不上；有些好聽名詞，如『再教育』之類，簡直成了刻毒的諷刺。

禁止德國復興經濟的政策，不僅從德國觀點看來是瘋狂的，而且從整個歐洲觀點看來也是瘋狂的。歐洲不僅缺少煤而且缺少德國所能供給的一切工業製品。魯爾區煤底產量，現在實祇有戰前百分之十五，鐵底產量也許祇有一九四四年百分之一。《經濟家雜誌》上星期說道：『困難的就

在於西歐繁榮很大部分

須取賴於魯爾區有個產

生財富的大規模工業集

中區。這個產生財富的

生物化學和戰爭

Eugene Varlin

準備做第三次世界大戰用的最可怕的武器中，有着生物的和化學的武器。應用生物武器的戰爭，就是拿細菌，病原菌，以及從有機體製成的毒物，來傳染和殺害人類及動植物。現在已知的病症，能由這種戰爭來傳播的，有流行性感冒，小兒麻痺病，虎列拉，傷寒，癲癇諸種。

在新的技術設備之下，生物武器底製造是十分便易的。美國政府在戰爭特別顧問喬奇默克（George W. Merck）在陸軍部報告中說：『生物戰爭武器底製造，在許多國家都是可能的，無論是大國或小國，而且不需要耗費大宗款項或設立大規模生產機關』。

今年一月十四日，《Newsweek》雜誌認為生物戰爭武器『比較火箭和炸彈更加可怕』。這話說得很對。在第二次大戰中，美國已經完成了一種疫苗，名為 *Toxin botulinus*，毒性如此猛烈，祇消人目不能見的小小一滴就可殺死一個人了。

生物戰爭最厲害的特性之一，就是這些致命毒物容易散佈。去年十月二十四日，加拿大衛生部長克里斯洪將軍（General Christison）說：『幾千個經過防毒手續的旅客，攜帶着傷寒，流行性感冒或其他未知病症的細菌，專為此用途而製造的，就可以侵略一個國家；用飛機裝載這些病菌，不經預告即飛來散佈，也可以達到這個目的。侵略國無須有甚麼重工業發展，祇要好好的組織這種進攻，是容易灑換和毀滅被侵略國的』。

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切強國，都儲藏有大量毒氣。其中幾種是有劇毒的。例如氯磷氣

怕的武器中，有着生物的和化學的武

評書

美國 Wendell Willkie 著，劉尊祺譯，中外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三年

八月重慶初版，一九四五年九月上海五版。

去年日本投降以前，據說自由中國有二本最流行的書，一是『中國之命運』，一是威爾基著的這

本『天下一家』。

如果這是新聞記者或普通著作家寫的書也許不會引人這般注意，可是威爾基是一九四〇年美國共和黨推出的候選總統，他這書代表的並非他個人的意見，而是美國底一種國策，或美國一部分資產階級的意見。一九四〇年大選時，威爾基以二二·三〇四·七五五票，對羅斯福二七·二四三·四六六票，而失敗。當時美國和世界輿論都是認爲威爾基比羅斯福更加反動的。大選失敗以後，威爾基和他的黨便改變作風，以更左的姿態出現，例如他批評羅斯福政策，反對同達蘭合作，主張多給俄國和中國物質援助，出庭最高法院替某共產黨員辯護等等，現在這本書也就是他的左傾姿態之一種表現。一九四四年，威爾基底黨雖然以此左傾姿態競選，但仍被羅斯福打敗了，可是威爾基這本書却成了功，他在美國打破了近年出版界紀錄。『戰時圖書評議會』定此書爲『戰時必讀書』，而且給著者一個獎狀，稱他有『走向公正永久和平道路的遠大眼光』，恭維他『對於他的國家完成了一個偉大的業績』。

書中究竟有那幾點表現得比羅斯福更左呢？驟然看來，似乎有如下幾點：

第一，如書名所示，威爾基主張國際主義，反對自給自足的民族主義，反對種族的和膚色的成見。他告訴我們：『世界不但在地圖上變得小了，在人們的心裏也變得小了，全世界有千百萬人抱着一些共同的理想，好像他們住在同一個市鎮裏一般。』（一二六頁）他說：『自給自足是全體主義國家的謠諑。在一個真正的民主世界中，一個國家再也用不着自給自足，正如紐約市用不着把牠自己從賓夕凡尼亞州獨立開來一般。』（八七頁）他又說：『我們從這些戰爭中懂得了一件事，就是把人類結合起來的並不是種族的劃分，也不是人類學上的考慮，而是休戚與共的觀念和相互接近的目標。』（一五三頁）

第二，威爾基反對帝國主義，同情於殖民地解放運動，主張廢除殖民地制度。他說：『我們相信這一次的戰爭必須意味着一件事，就是一些國家統治其他國家的那種帝國，必須結束。』（一四七頁）他說：『在非洲，在中東，在整個阿拉伯民族的世界，以及在中國和全部遠東，自由的意味就是逐步地但依照預定期序地廢除殖民地制度。不管我們喜歡與否，這是事實。』（一五〇頁）他又說：『一個真正世界的眼光是與一個外國帝國主義相背馳的，牠與一種可能在國內發展起來的帝國主義也

就能於十秒至二十秒鐘時間致人於昏迷和痙攣；

四五秒鐘後，中毒者就停止呼吸了；幾分鐘後

，他就死去了。如此有力的毒氣還有好多種。

這些毒氣為甚麼沒有拿來用呢？是帝國主義者發了慈悲心麼？他們的確是要造成這個印象的。一九三四年，當軸心國帝國主義者有要使用毒氣風聲時候，羅斯福便氣憤地說：『文明人類底一般輿論是不允許使用這種武器的。我們沒有

用牠，……而且無論如何不去用牠，除非我們的敵國先來用牠』。

這些偽善的話並沒有說出真實的原因。一九四一年三月三日的 *Time* 雜誌無意中說出真話了，即說：『沒有使用毒氣，不是因為毒氣不人道或不道德，而是因為牠沒有大效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了毒氣的，十三人中死了一人；而受了炸彈傷的，則四人中死了一人。美國做化學戰爭工作某軍官告訴 *Time* 雜誌訪員說：『若無制空權，毒氣便非好的武器；若

有制空權，則無須使用毒氣了』。一架裝載炸彈的飛機，比較一架裝載毒氣的飛機，能够殺死更多的人和毀滅更多的資產。

羅斯福說了那番人道的話以後，美國製造了好多比毒氣或炸彈更致命的新武器了。但無論羅斯福本人或其他繼承者杜羅門，都毫不遲疑地率先使用這些新武器！

美國改良了燃燒彈，使現存的任何滅火機關都無法撲滅牠燃起的火。牠把人燒成灰。牠比已知的任何起泡素氣都更有殺人效力。牠的煙使防空壕內的人窒息至死，與任何窒息毒氣一般殘忍。

對於那些毒氣，還有辦法可以防禦，對於這種

同樣不相容。』（一五二頁）他在書中很多地方對於英法荷比葡諸國統治殖民地的方法表示反對。

第三，威爾基同情蘇聯，贊美那裏施行的生產制度，說這是蘇聯堅毅抵抗力量之源泉。他主張美英戰後必須繼續與蘇聯合作，否則無持久的和平之可能。他說：『蘇聯是一個有效率的社會，牠行得通，牠有存在的價值。蘇聯對希特勒抗戰的成就，足以向我們大多數證明了這一點。』（四五頁）他說：『在這農場上，我祇看見一個壯年男子，他是經理。大部分工作者是婦女、兒童，還有幾個老人。原來蘇聯農場成了紅軍後備兵的偉大泉源；在今天，飼養全國的無甯是紅軍的妻子兒女了。』他又說：『我們用不着害怕蘇聯，我們需要學着與牠合作打擊共同的敵人——希特勒，我們需要與牠在戰後世界中合作。因為蘇聯是一個有動力的國家，一個富有活力的新社會，一種任何世界中不能忽視的力量。』（七二頁）

第四，威爾基批評民主國戰爭領袖。他說，邱吉爾聲明大西洋憲章能應用於歐洲，不能應用於印度、緬甸或不列顛帝國其他部，——這話是不對的。他說，羅斯福在北非所行的政策，的確是一個悲劇。羅斯福沒有拿出光明正大的理由說明美軍在北非登陸，而拿出的理由是同希特勒侵入荷蘭和比利時時候所說的一樣的。他又說史大林『未能把蘇聯關於東歐的希望公佈於世，也加重了一般人對於領袖們所宣佈的目標不能盡信的心理。』（一四二頁）他不僅自以為比邱吉爾和羅斯福更左，而且以為比史大林更左些，他說：『在我看來，史大林先生的聲明和大西洋憲章有一個共同的虛妄處，即都預測西歐將重行割裂為許多舊式的小國，各自有本身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的主權。正因為有這種陳舊的制度，縱使有成千百萬的歐洲人民被希特勒的『新秩序』所俘虜了。即使在希特勒篡政之下，他們還至少看出一種希望，就是創造出一個區域，其範圍之大足以使現代世界的經濟能够成功地發揮其效用。他們已從苦痛的經驗中體會到，在許多個別國家主義的高牆下分裂開的受限制的貿易區，以及隨之而來的縱橫闖闖的政治，使窮困和戰爭無法避免。歐洲許多小國家作為政治單位而重行創造出來，這是對的；把牠們作為許多經濟的和政治的單位而創造出來，如果我們真地希望為了我們自己的利益以及世界的和平與經濟安定計，使西歐穩定下來，就不對了。』（一三九頁）威爾基主張成立聯合國機構，並擬訂一些共同遵守的原則。

我們驟然看來，以上四點似乎可以表明此書底著作者確有『走向公正永久和平道路的遠大眼光』，確是資產階級政治家中獨樹一幟的人物。可是仔細分析之後，我們就明白完全不是這回事了。威爾基及他的『天下一家』書中所發揮的思想，代表的仍是美國帝國主義底利益，不過拿好聽的左傾的辭句來掩飾罷了。這種包了糖衣的毒藥比赤裸裸的毒藥更加危險些。

我們先從威爾基底反對帝國主義說起。威爾基底反對帝國主義是同希特勒，莫索里尼一流人底反對資本主義一樣的。資本主義本是生產機關私有制下的商品生產，祇要是這種生產，那麼無論是自由

燃燒彈簡直是無可奈的了。羅斯福總司令率先使用這種燃燒彈！

達到此次『人道戰爭』的最後光榮的，是原子炸彈。兩顆原子炸彈在廣島和長崎殺死了六十萬男女老少，而率先使用的，還是美國！

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時，要使用毒氣麼？那須有哪時毒氣是否改良到那種致命程度，能使帝主義者忘記了甚麼『人道的顧慮』而施行一個決定性的打擊。

譯自一九四六年四月六日的『戰士』週報

蘇聯參戰之後果

此次大戰中，蘇聯共死去一千七百萬人

，外加三百萬殘廢者，即共損失全國人口八分之一，或能工作人口六分之一。須待重建的地域，共有二十萬萬平方英里。戰爭損失算成金元，約為一千二百萬萬，即佔戰前全國一年最高收入（一九三八年）之六倍。德國侵入，使蘇聯減少約百分之六十的煤炭生產，百分之五十的鋼鐵生產，百分之六十的工業生產力。此外，鐵路損壞了六萬五千公里，火車站損壞了四千一百個，橋樑損壞了七千座。在一九四三年城市人口中三分之二僅消耗了一九四〇年所消耗的物品三分之一，而這年消耗量已大大減削了的。人們希望一九四五年的消耗量能達一九四〇年水準百分之七十。美國對蘇聯借款達到十五萬金元。

競爭的，如十九世紀的英國，或托辣斯壟斷的，如二十世紀初期西歐諸國，或國家統制的，如德意法西斯諸國，都是屬於資本主義的。法西斯底認識則不然，他們認為不受國家統制的資本主義才是資本主義，一旦受國家統制以後就不是資本主義了。我們大家都明白法西斯底欺騙。可是現在威爾基也是僅僅把帝國主義底一種表現看作『帝國主義』，至於他種表現，即美國財政資本所採取的方式，則他認為不是帝國主義的。在我們看來，則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發展到財政資本階級時，資產階級採取的政策，英國統治印度，法國統治安南，以及過去日本統治朝鮮，固然是帝國主義，但美國對於古巴，巴拿馬以及中南美洲諸國所行的政策，何嘗不是帝國主義呢？菲律賓固然是美國殖民地，但明天非律賓美軍完全退出而政治完全獨立後又何嘗不是美國殖民地呢？原來，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有兩種不同的方式，傳統的方式是直接統治，或依靠不平等條約去統治；新的方式則無需直接政治統治，也無需不平等條約，祇消依靠投資或『救濟』，就能達到支配一國經濟目的。這個新方式是美國帝國主義所採用的，因為種種有利條件使『美國積聚了如許巨大的財富，能『放棄傳統的方式，而採取這個新方式。日本來柄大使最後一次與美國國務卿赫爾談判時曾訴苦說：日本『太窮了』，不能採用美國的方式。我們試想，中美洲有個巴拿馬國是政治獨立的，又有個閩都拉斯國是英國直接統治的，但兩國羣衆受剝削的程度有甚麼兩樣呢？

美國生產力發展到如此程度，缺乏市場到如此程度以致此次戰爭之後，不僅需要意大利和日本這兩個敵國底殖民地，而且需要英法荷比諸所謂同盟國底殖民地了。但因美國能用新的方式，所以能以『解放者』姿態進入這些殖民地來，告訴那裏的民眾說：我是來解放你們，扶助你們獨立，使你們脫去『帝國主義』底枷鎖，『救濟』你們災荒，看哪這是我們帶來的貨物，你們不可購買別國的貨物。其實別國也難於同美國競爭的。於是在那些市場都落入美國手裏了。試看香港，牠是英國殖民地，但牠現在成了美國底市場，英國竭力掙扎還沒有用。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帝國主義政策，但是威爾基稱之為『反對帝國主義』。不，威爾基，現在整個美國資產階級都是以『反帝國主義』殖民地解放者姿態來施行這個帝國主義了。

要反對帝國主義，要不僅反對這國或那國這種或那種帝國主義，而是反對帝國主義本身，則必須推翻財政資本，即必須推翻威爾基及共同類者『美國的統治』。

這一點明白之後，我們就可以知道威爾基底『天下一家』思想，他的同情蘇聯，他的批評羅斯福，他的聯合國會議和原則，含有甚麼意義了。

他的『天下一家』思想並非真正的即革命的國際主義，而是美國一國統治全世界的企圖。世界變成如此之小了，大不列顛帝國在瓦解，其他諸帝國主義者更不用說，除了蘇聯以外，誰敢與美國抗衡呢？何況有個『蓄意的寶庫』存着，即各地的人都有深摯的友誼對於美國。美國若能統治全世界，資本主義也就可以延長生命至很久很久以後了。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大事件，若不知道牠的經過和教訓，就不能瞭解當前迫切的政治問題的。可惜國人對於此次革命研究很少，而已出版的專書或論文又都不滿人意。Harold R. Isaacs 雖是外國人，但他研究的成績是超出國人之上的。他中國住了好多年參考了好多可珍貴的材料，訪問了好多有關係的人，才著成了這『中國革命悲劇』。一九三八年出版。不僅熱情而細心，而且使用一種很好的方法。截至現在為止，關於此次革命，沒有比這更好的書了。故為譯出，按期登載，以貢獻於有志研究的青年。

譯者

中國革命悲劇

Harold R. Isaacs 著
唐盛 譯

是多到不可勝數的，四五萬萬人為生存而鬥爭，就從這上面表現出來。

中國，在大城市郊外，高聳的工廠烟囱影子照在田裏，那些田還是用鐵犁耕耘的。新式大洋船在沿海商埠碼頭上卸貨，那些貨品是用人工挑着或用古式木船載着運入內地去的。大卡车和貨車在街上奔跑，旁邊走着塌老虎車讓開，而大街小巷充滿這類車子。有些街道，兩邊開着小作坊，男人和女人還在用手工和簡單工具在那裏面製造貨品，但沿街走去，你可以走到大工廠，其中有發電機滾動着機器。飛機和火車跨越廣闊的區域，此區域除了人行小徑和千年前挖成的運河以外，沒有其他交通手段了。輪船在近海和內河航行，激起的波浪震動着旁邊經過的舊式帆船。在所有城市和鄉村，在所有從海口通到亞洲腹地的河流流域地上，這類的矛盾和對照

然而這是夢想。資本主義已無發展餘地了，限制牠的發展的，除了民族國家疆界以外，還有生產機關私有制度。即使如威爾基所希望，美國資本主義能够獨霸全世界，消滅那些障礙生產力發展的民族國家界限，但生產機關私有制仍是不能容許資本主義向前發展的，結果還要爆發危機，經濟範圍愈大，危機也愈猛烈，仍然非推翻資本主義不可。所以國際主義和社會革命是不可分離的。真正的國際主義必須依賴各國生產階級和被壓迫民眾共同的努力。

他的同情蘇聯，也僅僅在於蘇聯能為有力的盟國以打擊共同敵人的一點。他並未認為蘇聯底財產制度超出美國底財產制度以上，或至少能與美國相等。他是十分滿意美國底資本主義財產制的。那麼這兩種財產制度衝突時，他自然而然要反對蘇聯了。他說：『我們必須在戰後與蘇聯合作，……否則似乎不會有持久的和平的。』（四五頁）這話除了表示兩國戰爭之外還有甚麼意思呢？

他的聯合國會議主張已實現為『聯合國機構』了；他的『擬訂原則』建議也已被人採取成為『聯合國憲章』了。這種會議和原則的價值，我們已經領教過了。解決問題的，乃是『三頭會議』，乃是秘密外交，而不是萬聖堂皇的國際機構和好聽的原則。那麼他的批評羅斯福，是多餘的，因為倘若他自己即使用有『遠大的眼光』，也非領導人類『走向公正永久和平道路』的。

（唐盛）

產力簡直沒有甚麼進展。約二千年前，鐵犁的使用曾大大增加了農業生產。一部分由於這個推動，那時土地遂變為私有財產。封建的或由帝王所賜的土地從此可以買賣了。如此解放出來的勞動和如此積蓄起來的資本，一部份被國家吸收去經營公共工程，如築堤，開河，建築宮殿，城牆和要塞。

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未會發展。封建的剝削形式仍舊流行於鄉村。中國社會仍舊是許多農業小單位所構成的。家庭的或地方的手工業，供給社會以農業外的大部分需要品。國家直接參與商業和手工業，例如壟斷鹽鐵之類。生產系統和國內市場，二者都是受國家機關和工商行會所嚴密統制的。生產和貿易底城市中心發展起來，但似乎僅以奢侈品和土產品，如綢緞，漆器，瓷器，雕刻物，鐵器等等為限。須待更深刻研究國內市場底性質和規模，商業資本底運用，以及農業小單位底相對孤立性，我們才能說明馬克思所謂『亞洲式生產方式』及其驚人的自己更新的能力。（註一）

整個社會機構是堅固地建立在農民羣衆上面的。農民交田租給地主，交利息給商人和高利貸者，交捐稅給國家，捐稅或為力役，或為實物，或為金錢。國家是以地方官吏為代表人的，這些官吏更以寬鬆的等級制結合起來，經過各省督撫上達皇帝。這些官吏，在剝削農民的過程中，又和地主及商人互相結託。為了繳納日增一日的捐稅，地主便加緊榨取那耕種他們的土地的人。小地主則將土地抵押給高利貸者，而漸漸落於佃農或農工地位。每個朝代，達到其最高點而下降以後，牠的財政要求總是一天更多一天的，牠的官吏貪污也是一天更甚一天的。到了田租，債務，捐稅累增至不能負擔，而接連發生的天災又來加重生活困苦時候，地方性的抗租和抗稅就擴大而為全國性農民戰爭了。

以地主貴族為首的軍事派系，便來領導散碎的農民隊伍和外省兵士，發動戰爭，推翻皇朝，然後相互爭奪領導權，如此發生的國內戰爭和混亂，常常延續幾十年，有一次竟延續了幾百年；在此期間往往有人嘗試實行急進的社會改革和土地改革。這種改革，最有名的是第一世紀之初，漢朝亡後王莽底企圖，及第十世紀之末，唐朝亡後宋朝興起時王安石底企圖。

他們的主張，有幾點竟急進到了一種原始性的土地國有制，即廢除土地底私有權，而歸還給原來的主人，國家。又有幾點主張建立一種難形的國家資本主義。可是這些改革企圖沒有一次成功，因為激起這些企圖的農民戰

爭遲早總要耗竭力量的。那些軍事派系之中，總有一個派系最後爭得了領導權，而建立新的朝代。新皇帝和他的數代子孫正在鞏固他們的統治而漸漸消滅一切覬覦帝位的敵手時，鄉村中原來的社會形式又出現了，又漸漸開始土地集中過程了。

滿族皇朝就是於十七世紀中葉利用那種農民暴動而得到政權的。這些外族皇帝一經建立其統治，便有一種自然的利益，禁止中國與其他外國交接，而完成其征服全國的事業。在這時期，歐洲陷於那隨西方資本主義誕生而來的艱苦戰爭中。歐洲和中國之間祇有偶然的，插話性的交接，清朝初期幾個皇帝是能自由自在享受其上升時期的。可是過了二百年之後，人口增加又施行新的更重的壓力於土地了。此時清朝已走到牠的下降時期。牠的統治已在渙散，又不得不加重人民負擔，來應付全國各地先後繼起的反抗。當西方資本主義向外擴張的第一個浪潮衝擊中國海岸時候，中國社會已經走到政治崩潰和混亂時代之邊緣了。跨海而來的新蠻子，一到中國，就使得中國社會內部階級分化更加深刻了，複雜了，改變性質了。他們的來到，就是表示依照舊方法達到的舊解決，從此不能適用了。

四方諸國擴展貿易和積蓄資本的趨勢是無可抵抗的；牠們打破了那過去隔離天朝大邦和其餘世界的籬籬。經過這種接觸，終於發生了經濟，政治和社會上深刻變化。資本主義經濟把整個世界都牽入牠的軌道了。中國底孤立已經完結了。資本乃是新興的征服者，中國歷史上尚未見到的。以前越過北方疆區侵入中國的遊牧部落，漸漸同化於更老的中國文明底更有組織的社會生活，但現在來的新蠻子則是有技術的配備和物質的水準，非中國所能抵敵的。單靠傳統不能抵敵大炮，正如徒手不能抵敵機器，或轎子不能抵敵火車一般。中國抵抗西來的蠻子動力和武器時，祇能拿出牠的長久歷史，牠的廣大領土，牠的衆多人口。這些祇能有延殘喘罷了，

（註一）K.H. Whitehead 所著『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一書（萊普敦，一九三一年出版）至今尚被人視為此問題最有學理貢獻的。

俄國也有若干著作關於這個問題，但為分析此問題而需要的事實材料，其中大多數有待從中國歷史發掘出來。Oneing Ch. 所著『中國歷史上重要的經濟區域』一書（紐約，一九三六年出版），對此問題底一個方面，有新鮮的貢獻。

却不能改變鬥爭結果。

中國經濟和社會結構已陷於危機中了，現在從上至下更迅速感受外國侵入之腐蝕的影響。在經濟方面說，中國被打擊得爬不起來。外國商人依靠鴉片幫助，使得對華貿易經常有利於他們。中外貿易第一時期，許多銀子輸入中國，但一八二六年以後，銀子又流出去了。十年以後，鴉片代替銀子來償付中國輸出的絲和茶。（註二）工業製品隨後經過那鴉片所衝破的而又為一八四二年和一八五八年兩次鴉片戰爭中英法大炮所擴大的缺口，源源流入中國來。英國棉布阻止了中國土布底輸出，到一八三三年輸出貨單中已無土布項目了。十九世紀初期二十五年，中國輸出品急劇減少，同時輸入的鴉片又顯著增加。棉布輸入也不斷的增加，到一八七〇年遂佔中國全部輸入百分之三十一，幾年之後就代替鴉片佔據輸入品首位了。西方工業組織和技術底迅速進展，蘇彝士運河底開通，以及輪船底發達，共同刺激了西方對華貿易，使之從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四年中間增加了一倍。商品流入之後，不久就來了投資和借款。外國輪船公司，紡織廠，鐵路，電線，於十九世紀末年，就佔據中國經濟生活底支配地位了。

經濟上的征服，由於外國政治監督權之建立，更加容易成功。滿族政府已經束手無策了。牠起初還圖謀限制鴉片貿易，來阻止銀子流出，但經過幾次戰爭，遭受屈辱的失敗，而且償付重大的代價之後，就不能不放棄這種圖謀了。滿族政府屈服於西方人之後，就大大喪失其對於漢人的聲望和威權。外國人以大砲脅逼訂立的條約（註三），規定基督教（這是西方人侵略先鋒）能自由傳佈，鴉片能公開買賣。（註四）但是這些條約中最重要之點還在於規定：開闢沿海和內河商埠以為通商之用，限制中國關稅在百分之一五以下，租借地區造成後來種種外國「勢力範圍」，及設立領事裁判制使外國人不受中國法律管轄和免納中國捐稅，於是中國不過有獨立國虛名罷了，牠能免於明白瓜分，免於化為完全殖民地，祇因諸帝國主義強盜相互間有激烈的衝突原故。

鴉片廣佈，銀子流出，以及機製商品源源輸入，遂使那由於人口增加和耕地缺乏而發生的農村危機發展至極尖銳的程度。（註五）鴉片普遍服用使得鄉村財富流入城市，以至國內市場愈縮愈小，至於令人驚惶的程度。（註六）銀子流出結果，又使得通用銅錢貶值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因此

生活高漲起來。薄劣銅錢鑄出來使用了。（註七）外國棉布和其他商品陷

（註二）見 C. F. Reuter 著的『中國對外貿易』（上海，一九二六年出版），一六頁。關於鴉片貿易統計，見 Joshua Rowen free 著的『帝國藥物貿易』（倫敦，一九〇八年出版），

三四四頁；及 H. B. Morse 著的『中華帝國國際關係』（倫敦，一九〇八—一八年出版），第一卷，二〇九—一〇頁。

（註三）見 Wen Tsao Wu 著的『在中國輿論和行動中的中國鴉片問題』（紐約，一九二八年出版），五九—六〇頁。

（註四）『在中國人看來，牠們（按指鴉片和基督教）是攜手同來的，是共同奮鬥的，結果也是同時取得法律認可的』。——見 Rowntree 著的『帝國藥物貿易』，二四二頁。

（註五）據一種估計，一七一二年和一八二三年之間，人口增加，二三七·〇〇〇·〇〇〇，即約增加百分之一九四。——見 P. H. S. Wells Williams 著的『中國』（紐約，一八八二年出版），第一卷，二八三頁。據另一種估計，一七四一年和一八五一年之間，人口從一四三·〇〇〇·〇〇〇增加至四三二·〇〇〇·〇〇〇，即約增加百分之二〇〇。——見 P. H.

Parker 著的『中國，牠的歷史，外交和商業』（倫敦，一九〇一年出版），一〇〇頁。據官廳記錄，一六六一年和一八三三年之間，耕地增加僅有百分之三五，即從五九四·三五七·〇〇〇畝，增加到七四二·〇〇〇·〇〇〇畝。——見 Chen Shao-Lyan 著的『清代賦稅制度』（紐約，一九一四年出版），五一頁。

（註六）見一八二八年林則徐奏章，P. C. KUO 著的『第一次中英戰爭考證』（上海，一九三五年出版），八二—八四頁有此奏章英譯。

（註七）在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之間，物價高漲百分之二〇〇，一八四九年和一八五一年之間則高漲百分之四七〇，見一篇俄文論文，在『中國問題』雜誌內，莫斯科出版，一九二九年，第一期。

中國手工業於絕境，尤其在南方諸省。一八一九年會有三·三五九·〇〇○四土布輸出外國，到了一八三三年祇有三〇·六〇〇匹輸出，以後二十年則差不多完全沒有輸出了，於是那些織工失去了維持生存的手段。（註八）最後，好像人力還不够残酷的，上天也來幫助摧殘舊制度。十九世紀中葉那幾十年間，幾乎沒有一年那些大河流域及其他地方不發生水旱蝗疫等天災。

這一切天災人禍累積結果，就是羣衆底貧困和大規模流動人口底造成。西南苗族和西北回族這些少數人種中間發生的零星的暴動和反抗，就已宣告有一新的農民戰爭開始了；依照事變發展底傳統路線，這戰爭將證實當時統治的皇朝天運已終，將催促新的皇朝興起，代替其位置。可是正當外省在醞釀着農民戰爭時，中國統治階級此次竟有辦法使自己中興起來，即是以直接和間接參加對外貿易利潤爲手段。

各地通商口岸，商人和官吏早已利用他們與外國人交接機會積累巨大財產了。一八三〇年以前，當外國船隻來廣州一口貿易，鉅下銀子只購買茶絲運回歐美去時候（註九），一些銀子很少能落入茶絲生產者手中。大多數銀子仍舊留在廣州商人和官吏手裏。（註十）所謂『十三行』底各單位，即那些政府特許與洋商往來的商行主人，以及能任意抽稅派款的地方官吏，都發了大財，尤其靠私賣鴉片發財。這種商資格常有二〇〇·〇〇〇兩的價值。廣州某富商曾自誇有二千六百萬兩財產，還有幾宗大款酬勞當地官吏以報償他們的幫忙。（註十一）

這些商人和官吏構成了一個新的階級，買辦階級，即外國資本和中國市場之間的經紀人。這是帝國主義衝破中國社會舊結構後最初造成的直接影響之一。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上佔據的支配地位，很有效驗地阻塞了本土資本主義獨立發展之大道。這些中國商人和官吏本是從地主出身的，他們由對外貿易賺來的財富並不投放在資本主義企業，而投於土地，如此一來顯然加速了土地集中和小地主破產。（註十二）大地主送他們的子弟到城裏去，加入那有大利可圖的買辦行業。買辦沒有拿錢去鄉下買地，是很少見的。他們的利潤不僅回到土地去，而且加入高利貸資本，借錢給那些收入減少和物價及捐稅高漲而虧空的農民。舊時地主兼商人的資產階級因爲不能與外國人更大的力量和更高的技術競爭原因，遂轉變爲買辦，

爲高利貸者，爲投機者，有其利益在城市和鄉村。

整個國家機構也參加這個過程。滿族政府，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了他們的武力和聲望於其漢族臣民面前。（註十三）滿族官僚經過幾番戰敗，已因收受賄賂和私販鴉片而趨於腐化了。（註十四）北京頒發的聖旨，常常沒有奉行，北京離得遠，但外國銀子響聲是很近的，而且很有誘惑力的，中國官吏，在理論上說雖是清廉的，但已有貪污傳統了。官吏自己生活既已依靠賦稅收入來維持，所以從很古時代起就有甚麼『養廉』存在了。對外貿易發了財的人，更開闢了不正當進款的新源泉，以此發展那種貪污傳統。清代中葉以後，國勢日趨下游，中央賦稅收入減少，財政困難增加，於是一切清廉外表都付諸東流，而政府官職成爲公開賣賣對象。人們不是靠才學得官職了，而是靠金錢得官職。自然，惟有已經發財的商人或買辦才能替他們的子弟購買官職。官職買賣通行以後，商人，地主和官吏就更加明顯成了同一階級底各部分了。（未完）

（註八）見 H. D. Fong 著的『中國棉織業』，在『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內，北平出版，一九三二年十月，表三十三。

（註九）H. B. Morse 估計一八三〇年輸入中國的銀子值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見『中國對外貿易』一文，在『中國與遠東』雜誌內，G. H. Blakesee 編，紐約，一九一〇年出版，九七頁。

（註十）見 G. F. Taylor 著的『太平革命』一文，在『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內，北平，一九三二年一月出版，五五八頁。

（註十一）見 W. C. Hunter 的『The Far Kwe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1825—44. London, 1881, p. 48.

（註十二）Taylor 著的『太平革命』，五五十六頁。

（註十三）見 T. T. Meadows 著的『中國人及其暴動』（倫敦一八五六年出版），二三三頁。

（註十四）見 J. S. Hart 著的『中印鴉片貿易』（倫敦一八八四年）五一頁。